

古都名城研究

中国历史城市研究的基本问题与研究取向

◎席会东

(西北大学 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安 710069)

摘要:城市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更是一种生存、生活和权力运作的空间。城市中的宫、市、寺、宅、桥等每一种设施都是一种具有多重意义的空间,可以通过对城市形态的分析来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和制度运作、政治文化精英的活动、事件发生的空间过程。现有的中国历史城市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及相关的研究取向:一是“政治文化”取向的传统城市研究与古都学中的城市研究,其主要内容是以城市中的政治人物和事件,都城转移的规律,以及以志书为主要载体的城市制度和文化的;二是“区域空间”取向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历史城市的形态、功能、规划的阶段特征与变迁规律;三是“社会经济”取向的城市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现代学者从资本主义萌芽等角度探讨明清以来的城市发展,而日本和西方学者则更是多偏爱中国城市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三种取向的研究都取得了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但也都存在缺陷和不足,中国历史城市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城市史;研究取向;政治文化;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学术空间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23(2016)03-0001-08

收稿日期:2016-08-20

作者简介:席会东(1981-),男,河南巩义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史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市是汇聚一个时代各种问题的结点,可以通过对都城及区域重要城市的解析来了解一个时代。城市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更是一种生存、生活和权力运作的空间,城市中的宫、市、寺、宅、桥等每一种设施都是一种具有多重意义的空间,可以通过对城市形态的分析来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和制度运作、政治文化精英的活动、事件发生的空间过程。

现有的中国城市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及三种相应的研究取向:一是“政治文化”(political-ideological)取向的传统城市研究与古都学中的城市研究,其主要内容是以城市中的政治人物

和事件,都城转移的规律,以及以志书为主要载体的城市制度和文化;二是“区域空间”(regional-spatial)取向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历史城市的形态、功能、规划的阶段特征与变迁规律;三是“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取向的城市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结构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后受到强调社会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以及西方学者的影响,中国现代学者开始从资本主义萌芽等角度探讨明清以来的城市发展,而日本和西方学者则更是多偏爱中国城市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总体来看,三种取向的研究都取得了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但也都存在缺陷和不足;中国历史城市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笔者在梳理中国城市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评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出具有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基本问题和分析工具,梳理出这些研究的脉络、渊源流变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寻绎其中的学术理路和问题所在,探讨中国城市研究存在的空白点与研究空间。

一、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城市研究与古都学视野中的城市研究

在中国传统学术结构中,存在一个都城资料的谱系,从《三辅黄图》《洛阳记》《洛阳伽蓝记》《两京新记》《长安志》《河南志》《雍录》《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到《历代宅京记》《唐两京城坊考》等都城史料一脉相承,从单纯搜集资料到严密的考证,体例和内容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发展线索,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资料系统。在性质上,这些都市史料本质上是记录都城城市景观和城市人物、事件的城市史。在研究方法上,记载同时代都城的学者以文献搜集和实地考察为主,而记录前代都城的学者则以文献的搜集、辑录与考订资料为主。

民国抗战以来,时局动荡,都城播迁,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都城状况及其变迁规律,对历史时期的主要都城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些历史地理学者继承了这一研究传统,在史念海的倡导下,中国古都学会于1983年在西安宣告成立,并创办会刊《中国古都研究》,为学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来自历史、地理、考古、经济、文化、艺术、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学者,打破了学术畛域藩篱,致力于建立综合性的“古都学”。史念海指出,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也即基本问题是古都的成立要素、演变历程与变迁规律。具体而言也就是古都的形成因素:自然环境、经济因素、军事因素和社会基础,选择都城的过程也是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利用交通要冲的位置、凭恃险要地势,进而进行疆域国土的经营过程。都城的位置与王朝的边患威胁与对外政策、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以及经济重心的都有密切的关系。^[1]

古都转移的规律是古都研究的重要课题。谭其骧等学者指出,中国古都的转移与中国区域社会、经济、交通结构的变迁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历史前半期都城多集中于黄河流域,并从西向东逐渐推移,这与中国经济重心渐次东移,区域交通干线有西北陆路交通和东部海路交通转移都密切相关。与此相应的是,先秦时期中国政治文化格局主要是东西对立,魏晋南北朝以来演变为南北对立,而中原政权的主要边防威胁也由西北地方转移到东北地区。^[2]

对历代都城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古都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在其《长安の都市計画》(讲谈社,2001年)一书中,将中国历代都城分为三种情形:一是新王朝初建之际开始重新测量、建设的城市,如汉代长安、北魏平城、隋代大兴、元大都等;二是沿用前代故都,并将之加以改造,如北魏洛阳、唐代长安、明清北京;三是将原来的小城市扩建为国都,如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所以北宋东京与汉唐长安和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在格局上有很大不同。^[3]

通过墓志、壁画等出土文物、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复原古代都城居民结构和居住方式成为古都研究的新趋势,李健超对隋唐长安、洛阳两京的研究开创了这一研究路径。

总体来看,古都学视野中的城市研究基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都邑沿革”之学,研究物件主

要集中在历代都城,虽然借鉴了社会经济史和地域空间史的研究视角,但最根本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然是源自中国传统史学的“制度文化”史。

二、历史城市地理学对城市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构建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奠基人是侯仁之。通过对北京、承德、芜湖、淄博、邯郸等历史城市多年的研究实践,侯仁之在 20 世纪 50 到 80 年代从理论上明确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性质、任务和内容,并且建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学科性质是属于地理范围,不同于传统的都邑沿革之学,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必须与城市规划相结合才能获得长足进展。他总结出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当包括:城址的起源和演变;城市职能的形成及其演变;城市面貌的形成及其特征;城市位置的转移及其规律;地区开发和城市兴衰的地理因素等几个方面。^[4-5]侯仁之的理论核心是从现实地理状况出发,说明现代城市面貌的形成过程而研究历史城市地理,揭示现有城市的起源、城址演变、城市职能以及城市面貌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这无疑是具有范式(paradigm)意义的理论和方法贡献。

侯仁之还提出了一系列与其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其具体程序是:解释现存城市的形态及影响职能布局的历史因素,然后用历史溯源法,从近至远,逐步复原出各历史阶段的城市面貌和空间结构。为了实现往日城市的复原,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历史文献图籍对古代城市选址环境、迁移过程、轮廓形态和内部结构的记载,进行分析释读;其次,一定要采用现代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考古学的野外考察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文献记载对遗址旧迹给予定位,编绘出历史城市复原图。在完成历史城市复原图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往日的地理特征,分析地理环境与历史城市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进而进行人文和社会领域的科学分析,这些方法可以称之为“侯仁之研究法”。

李孝聪继承和发展了侯仁之的城市研究理论和方法,把地理学的形态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运用到实证性的城市个案研究中,对华北平原和运河城市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中国城市的特征和发展规律。^[6]他以侯仁之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把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概括为:1.城市兴起的原因和城市选址的地理条件;2.城市职能的形成与内部空间结构;3.城市外貌形态的塑造和演变;4.城市位置的迁移及其兴衰的规律;5.区域城镇体系的形成演化与地区开发的关系。这些表述更加明确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成一农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方法——要素研究法:即通过对古代城市形态构成要素的分解和长时段分析,揭示城市构成要素发展脉络及其形成原因,再通过分析城市各要素间的关系和重组,构建起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形态的模型,进而分析城市形态模型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其变迁。^[7]虽然他提出的“要素研究法”还有待于完善,但在拓展研究领域、探索城市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多有创新。

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侯仁之及其弟子对于明清北京城的研究,侯仁之对北京城形态与结构的研究开创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先河^[8-10],也确立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基本范式,创立了“北京学”。与古都学视野下的城市研究相比,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主要是用地理学中“地域空间”“形态功能论”的视角来研究城市,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利用西方学术工具研究中国城市问题的努力。两种研究取向的相同之处是,由于受到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中国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影响,采取两种研究取向的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就具体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基本上都以侯仁之所构建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框架为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城郭结构。城市结构一重、双重或是三重,郭城和内城的布局与相互的位置关系。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却也复杂,城市考古的困难和文献材料的阙如都对其有制约。对这一问题做过系统研究的是杨宽,他

从制度史的角度对中国历代都城的形制进行过系统的梳理,提出中国都城经历了由坐西朝东向坐北朝南、由西城连东郭到东西南三面郭区环绕北城的布局转变,决定这种转变的核心原因是礼制的转变。宿白从城市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城市的形态特征和演变规律做过系统的梳理,而且这些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发掘和实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非常具有说服力。

城市形态。章生道提出“复式城市”的概念,归纳出了几种类型:主要有族群隔离型如清代遍布华北和西北的满汉双城制,跨越河流两岸的集合型城市,府与首县异城型等几种形制的复式城市。李孝聪进一步归纳出了运河沿线城市具有行政中心的衙署区和沿运河的商埠区的分化特征;近代以来通商港口城市形成了老城行政区和租界新区的复式格局;20世纪初,修建铁路的中国城市呈现出老城和火车站周围形成新的商埠区的复式城市形态。“复式城市”的概念能够使人从“点”与“面”两个层次深化对中国城市类型与形态特征的认识。

城墙形态。传统观念认为,城墙一直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军事防御是其主要功能。然而,成一农对历代筑城与毁城以及城墙的形态的研究却表明,建筑城墙并不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常态,统一王朝初期往往会拆毁城墙。而且,中国城墙的形态类型多样,由城壕到夯筑土城再到明朝的包砖城墙,形制与功能均有所不同。

里坊制。里坊制或坊市制是中国中古城市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中古城市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台湾学者刘淑芬探讨了里坊制的制度渊源。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的“里坊制”。在《唐代的长安与洛阳》一文中,妹尾达彦首先区别了里制、坊制、坊墙制、坊市制,整理了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画出里坊制的谱系图,纠正了许多前人错误的观点。

城市制度的渊源与流变。自陈寅恪提出中国城市制度变迁的渊源流变关系之后,从文化和人事转移的角度探讨城市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中日两国学者研究东亚历史城市的通识和常用的分析工具,日本学者尤其关注曹魏邺城与隋唐长安城对东亚渤海、新罗、日本等政权都城形态的影响。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阶段与规划理念。贺业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文本和理念都做出了系统而精细的研究。^[11-13]堀达宪二则对风水思想对东亚城市形态的影响进行了梳理。^[14]这些研究有助于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中国古代城市的结构特征与形制渊源。

总体来看,历史城市地理学领域的城市研究主要是采取地域空间和形态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规划、形制、转移的地理基础与文化渊源,对了解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变规律乃至现代的城市规划与名城保护都有重要意义。然而,历史城市地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学者对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主要是从都城絀绎出来的,对地方城市的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

三、社会经济史视野中的城市研究取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史观的影响,关注城市经济生活的研究,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江南城市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教条主义”的烙印,但是却也发掘了不少社会经济史史料,提出了不少问题。日本学者在吸收东西方两大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其研究具有城市经济史研究传统,也更为关注理论的总结和方法的探索。内藤湖南于20世纪初创立“唐宋变革论”^[15]之后,日本学者分别从各个角度去回应这一理论,宫崎市定、加藤繁、斯波义信等都从城市变迁的角度回应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中国城市的制度性变革始于8世纪下半叶,至北宋时达于顶点。^[16-17]这些观念和相关研究使中国都市研究成为日本学术界的重要课题,奠定了日本学术界的都市史研究传统,并影响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取向。斯波义信提出“商业革命”论,指出唐代的“官市制”和“坊墙制”等制度崩溃后,宋代社会出现了显著的城市化趋势,并在农业商品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国性市场圈。^[18-19]他强调北宋东京与汉唐长安和洛阳的政治性都市的

不同,是建立在商品货币经济、全国普遍城市化和市场体系基础上的商业化都市,但仍具有城市上层人物与国家政治和政府财政紧密结合的特点。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唐宋变革”和“商业革命”等分析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城市空间的“场域”研究,并力图复原中国古代的城市景观。斯波义信从宋代城市研究向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规律拓展,从城市空间转换的角度探讨中国城市的演变过程与规律。^[20-22]伊原弘倡导以解剖学的方法来解析城市,以复原城市景观。他从城市精英、社会救济、婚姻圈、公共墓地等城市族群和空间出发,解析了北宋都城开封的多元文化特征。^[23-25]平田茂树则把地域社会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到宋代城市研究之中,分析如何认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分析社会意识与社会意识形态中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和关联性。^[26-28]平田茂树通过分析以宋代城市中同乡、同姓、同学、同年、同官等各种以“同”为机缘所形成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纽带,揭示了宋代官僚政治集团的构造和朋党政治形成的社会基础。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桥梁、州学等社会设施、教育设施的研究,来解析城市地域社会的秩序构建过程。

在西方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施坚雅运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进行历史城市地理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研究,对明清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区域经济和地方市场结构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并构建起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模式。施坚雅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提出了城市体系问题,并把城市置于聚落体系和区域体系及交通网络之中,关注城市与区域、城市、市场、交通之间的关系问题,注重地域空间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向的结合,这些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对于以个案城市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中国学者有较大的启发。在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马克·埃尔文和牟复礼在邓尼斯特·威切特对唐代城市、斯波义信对宋代城市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所谓“中世纪市场结构和城市化的革命”的主要特征:放松对县城设市的管制,官市制度瓦解,坊市分隔制度消失,城内城郊皆可交易。城市商业郊区发达,市镇涌现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开放和学术交流的增多,日本和西方学者的城市研究理论和方法也随之传入中国,不少中国学者借鉴施坚雅等人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西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明清城市展开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取向的研究,在以城市社会史和城市经济史领域取得不少成就。其中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城市社会经济史的研究^[29-32],樊树志、刘石吉、巫仁恕等诸位学者对于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33-36]都是代表性研究成果。

与中国历史前半期的城市史研究相比,明清城市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和资料系统更加多元,除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志书和方志系统等官方文献系统之外,还有大量的笔记小说、地方文人的撰述等地方性资料系统,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复原明清城市的生活场景。在研究领域和关注问题上,明清城市研究者多利用多重资料系统研究城市社会史和城市生活史。在研究方法上,汉唐城市研究多运用考古学的资料和方法,而明清城市研究则更多运用田野考察和城市历史地图研究法^[37-42],着重复原城市的形态与景观。

从研究地域上来看,明清城市研究多集中在城市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且多与区域研究和城市体系研究相结合。除了长江下游以市镇研究为代表的“江南模式”研究之外,长江中游和上游的城市研究也各有特点。长江上游的区域城市史研究在研究路径上以城市社会为主,其中具有代表性成果是王笛对于成都及其他城市的研究。^[43]长江中游的城市研究则以鲁西奇对汉水流域的城市研究最有代表性。

在地方城市研究之中,鲁西奇的《山城及其河街:明清时期郾阳府、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城墙内外: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州、县城的形态与结构》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另外,对于明

代卫所城市和清代满城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明清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新的课题。

中国学者的明清城市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于注重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生活史,忽略城市形态和城市管理制度的研究;从地域上来看,由于经济转向东南沿海和沿江,城市研究也主要集中与这些区域,而内陆城市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缺乏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城市的比较性研究。

在近代城市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关注前期近代中国城市的形态、结构、类型及其发展趋向,城市化、城镇体系,或隐或显地以西方近代城市及其发展模式为潜在的参照系,以此为背景,学者关注城市中商品组织、市民阶层,是否存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主要的研究旨趣,是探讨传统城市中出现的新因素,并深入分析这些新因素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与影响,转型的过程,如对开埠城市中的租界、洋行、公园、车站等新因素和空间进行研究,因此沿海港口城市和沿江开埠城市是近代城市研究的主要对象。^[44-45]其中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等都是学者关注和研究最多的对象。

近代城市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忽略了中国城市固有的形态和结构特征,过于关注城市中的新因素与所谓的“转型”过程,对于中国城市的传统特征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变迁关注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细致分析近代城市中的传统因素和新因素是怎样交互影响,从而改变中国城市面貌的,转型和变迁的过程是怎样展开的。

四、中国城市研究的问题与空间

回顾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城市研究,在取得众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研究方法上,学者偏重于将某座城市作为“面”来研究其选址、城址转移、街道布局等城市外貌形态特征,而忽视了城市作为“点”和“面”两方面特征的兼顾,对城市关系乃至城市体系的研究不够深入。既有的城市研究多以都城为模板,从中抽绎和归纳出一个时代城市形态特征和演进规律,对地方城市的研究不够深入。而都城只是一个时代城市的特例,不能代表一个时代城市的全部面貌,仅从都城归纳出一个时代的城市特征在方法论上有缺陷。城市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都城的比较,尤其是唐代长安、宋代开封与元明清北京的比较,忽略不同时代同一城市的比较。这些城市本身就有不同地域和社会背景,从它们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未必适用于对整个时代城市的判断。

中国学者多从经济史、制度史和政治史旁涉城市研究,在理路和方法上或是采取局部和个案的研究,或是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阐述,问题意识、理论指向、分析工具不够突出。城市选址的地形地貌分析流于浮泛,没有真正与城市选址和形态之间建立内在的逻辑联系。对城市变迁的原因分析往往忽略城市变迁中的地域特点和自身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分析忽略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或是对时代军事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不够具体和切实。

如果深入分析,城市研究还存在一系列课题: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宋元明清地方政府和地域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变迁对地方城市形态有何影响;制度规定、地方文献、笔记小说文集和考古发现中的地方城市形态是否一致;唐代的坊市制和里墙制在城市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长期有效地实行;这一制度在地方城市中的实行程度如何,中世纪地方城市的形态究竟如何,是否建立过完整的坊市制和城里墙制度;唐宋之际是否真的发生过所谓的“城市革命”,打破坊墙的意义是否真的具有革命性;宋元地方政府的多元权力结构在地方城市形态和结构上如何反映;城墙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军事防御还是政治控制的功能更为重要,明清之际的城市是如何突破城墙的;中国近代以来城市近代化进程是自身积累的产物,还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结果;租界区、车站商埠区等“新因素”与传统城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在城市的转型中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农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和普通民众是如何看待城市的,历代的“城市意象”有何变

迁。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精心研究。

现有城市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中国城市史还有较大的学术空间。首先,可以把城市研究和区域研究相结合,分区域来研究中国城市发展演进的脉络。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历史上不同区域的城市具有很大的差异,不能简单以都城来概括一个朝代的城市特征,而应该以区域为单位,分析区域内城市的形态结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虽然中国历代的疆域结构不尽相同,但大致上可以将中国城市分为中原礼制主导型城市、江南经济主导型城市、西南地貌主导型城市、北方边疆军事主导型城市、西北绿洲商贸主导型城市、高原宗教与环境主导型城市等几种类型,在分别探讨集中类型城市形制特征并将之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每个时代城市的特征和演变规律。

其次,可以拓展传统的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视野,选取城市中具有空间意义的地理事物,如墙、门、桥、市、寺、衙署、住宅等,探讨它们在城市生活和社会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复原城市的政治运作空间和社会生活场景,探讨宫、殿、阁和衙署位置变化所反映的权力运作、决策过程,从空间上分析城市制度。从都城研究扩展到其周边城市,把城市作为一个“点”来研究城市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从都城到地方城市、再到乡村腹地之间不断变动的空间结构与运作场景。

再次,可以从城市研究切入政治史和制度史,寻找城市史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结合点,研究城市政治史。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从城市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唐宋变革”,陈寅恪也一再强调北魏洛阳的金庸城在北魏政治斗争中的关键性、唐长安城玄武门在唐代“宫廷革命”中的重要性,但这种思路的研究也还远未展开。循这种思路,可以从城市空间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和制度史,通过对衙署、政治人物宅第位置的分析,探讨门阀、朋党形成的空间基础,勾勒出一副完整的城市政治史。

最后,可以从城市史的视角,利用各种史料,追寻城市的传说故事,追索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及其精神世界,复原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景。

对城市史的回顾与展望,有助于推动学界对“唐宋变革论”“城市革命论”“明清变革论”“城市近代化”等理论和分析工具进行反思,从而推动中国历史城市研究的深化、进而推进中国史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J].陕西师大学报,1990(1、2).
- [2]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C]//长水集续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妹尾达彦.中国都市の景观[J].史境,1991(22) 25-300.
- [4]侯仁之.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J].地理学报,1979(4).
- [5]辛德勇.侯仁之先生对于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4).
- [6]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 [7]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8]侯仁之.北京历史城市地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 [9]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10]朱竞梅.北京城图史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11]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 [12]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 [13]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 [14]堀込宪二.風水思想と都市の構造[J].思想,1990:73-99.
- [15]内藤湖南.支那近世史[M].京都:弘文堂,1947.
- [16]唐代史研究会.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M].东京:刀水書房,1988.
- [17]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東アジアの古代都城[M].东京:吉川弘文館,2003.

- [18]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M].东京:风间书房,1968.
- [19]斯波义信.中国中世商业[C]//中世史讲座·中世都市.东京:学生社,1982.
- [20]斯波义信.宋代的都市にみる中国の都市の特性[J].历史学研究,1990(614):1-6,64.
- [21]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
- [22]斯波义信.中国的都市空間とその近代化プロセス(要旨)[J].アジア文化研究別册(国际基督教大学学报),1994(5).
- [23]伊原弘.江南における都市形態の変遷—宋平江図解析作業[J].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集,1983(1).
- [24]伊原弘.宋代を中心としてみた都市研究概論——寄木細工の多面体解剖学[J].中国の社会と文化,1987(2).
- [25]伊原弘.中国开封の生活と岁时——宋代城市生活繪卷[M].东京:山川出版社,1991.
- [26]平田茂树.宋代の朋党形成の契機について[J].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集,1998(6).
- [27]平田茂树.宋代の社会ネットワーク[M].东京:汲古书院,1998.
- [28]平田茂树.宋代人の认识——相互性と日常空間[M].东京:汲古书院,2001.
- [29]李伯重,周生春.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30]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J].清史研究,2001(3).
- [31]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中)[J].清史研究,2002(1).
- [32]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下)[J].清史研究,2002(2).
- [33]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 [34]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35]巫仁恕.明清近代市镇墟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九州学刊,1993(3).
- [36]巫仁恕.清代湖南市镇的发展与变迁[J].汉学研究,1997(2).
- [37]广东历史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广东历史地图集[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
- [38]李诚.北京历史舆图集[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档案局.广州历史地图精粹[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 [40]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 [41]武汉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武汉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
- [42]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
- [43]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44]张仲礼.熊月之.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45]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研究丛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Researching Approaches for the Chinese Urban History

XI Huidong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ing achievements for the Chinese historical urban can be summed up in three main areas with related research-orientations: The first one is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and the “Ancient Capital” research with the political-ideological orientation. The second one is the urban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with the regional-spatial orientation. The third one is the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ith the socio-economic orientation. There ar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wit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hree researching area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flaw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three researching areas.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academic space in the research for the Chinese historical urban.

Key words: China urban history; Researching orientations; Political-ideological approach; Regional-spatial approach; Socio-economic approach

(责任编辑 卞建宁)